跨越千年的茶叶天路之旅

清晨，第一缕阳光刚刚洒落大地，世界屋脊的藏族人家纷纷品尝起酥油茶，悠然迎接新的一天。

无论是大街小巷随处可见的甜茶馆，还是“宁可三日无饭，不可一日无茶”的谚语，抑或是迎客必备的酥油茶，无不昭示着茶在高原人民生活中举足轻重的地位。

透过一缕缕茶香，仿佛可以听到茶马古道上悠扬的铃铛声。

西藏易贡茶场工人在采摘茶叶（5月22日摄）。 新华社记者张汝锋摄

茶香千载空悠悠

夜幕降临，藏东昌都市茶马广场灯光璀璨，醉人的藏歌回荡山谷。历史上，四川、云南等地的茶叶通过茶马古道源源不断进入西藏，昌都是茶马古道滇藏道和川藏道的交会点。

茶叶进入西藏历史悠久。阿里地区噶尔县故如甲木考古发现1800年前来自内地的茶叶等实物。西藏也流传着文成公主带茶入藏以及小乌衔茶为藏王治病的说法。

身处高寒地带的藏族人民常食牛羊肉等高蛋白、高热量食品，助消化、解油腻的茶叶，逐渐成为必需品；而四川、云南等地盛产茶叶。一地产茶，一地需茶，茶马互市遂成为汉藏之间的一件大事。

清朝敞开对藏地茶叶的供应，带动了汉藏贸易的全面发展；民国时期设立康藏茶叶公司，新中国成立前每年输藏砖茶约30万条包。

然而，茶叶入藏并非易事。

2002年4月，记者在云南丽江见到时年76岁的宣绍武。这位走完茶马古道全程的老人当时说：“我是在抗日战争最艰苦的年代踏上茶马古道的，那年我16岁。给我的印象是，世界上恐怕再也找不到如此险恶的道路了。”那时，每天出入丽江大研镇的马帮骡马就有300余匹，宣绍武曾亲眼看见过溜索的马夫肚皮被藤篾划破露出肠子的情景。

四川省雅安市天全县小河镇红星村甘溪坡，是背茶包进藏的必经之路。村旁的石路上，可以看到星星点点的拐子窝——背夫途中休息时，将丁字拐杵于石上支撑背架，日复一日，木拐在坚硬的石头上留下了永恒的印记。

“茶马古道既是历史上汉藏交流融合的一个重要渠道，也是汉藏民族团结的纽带和象征。”西南民族大学副教授田茂旺说，英国殖民印度后，大规模种植茶叶，企图在西藏倾销。为此，清朝中央政府展开了坚决斗争，保证内地茶叶迅速销往藏地。

一茶一叶总关情

在清晨的西藏城乡，伴随电动酥油茶机的搅拌声，浓浓的茶香扑鼻而来。

“过去用传统的木质酥油桶，打茶时需上下抽拉，费时费力。”81岁的确朗老人每当接过晚辈们端来的热茶，总是感慨万千。

在旧社会，确朗是一位农奴。在他的记忆里，农奴喝不到酥油茶。“即便是清茶也不敢放开喝，砖茶煮完再晒干，重新煮，要反复三四次。”

喝茶不再难，是在西藏和平解放后。

西藏和平解放后，党和国家十分重视边销茶的生产和供给，在四川雅安、云南下关等地建立专门的生产厂家，每年输入西藏边销茶10万至14万担。

新华社在1956年6月6日播发的《藏族人民今年将喝到更多更好的紧茶》报道中写道：紧茶（即沱茶）是藏族人民最喜欢饮用的上等茶，用它做出的酥油茶特别芳香可口。藏族人民把这种质量好、价格合理的紧茶称为“解放茶”。

西藏自治区商务厅市场运行处副处长李梅说，为让西藏群众喝上便宜茶，国家制定了诸多优惠政策。

1965年，国家对边销茶价格进行调整，与1959年相比，价格降低50%。1988年内地调入西藏的边销茶提价，但西藏仍按平价销售，亏损由财政专项补贴。

在雅安茶厂，一款珍贵的茶叶样品至今仍被精心珍藏着。1985年，西藏自治区成立20周年之际，中央在雅安茶厂订购40多万份“民族团结”牌的茶砖作为礼品，送给西藏每户农牧民。2015年，西藏自治区成立50周年时，中央代表团赠送的全自动酥油茶机以及精美的茶碗，受到农牧民欢迎。

根据西藏等地区成年人边销茶消费调查数据，西藏成年居民每年消费茶叶16.9斤，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千茶万茶雪域开

拉萨市北京路，岗坚茶叶股份有限公司门店内，一些造型独特、包装各异的茶叶产品吸引着顾客。

在与之不远的西藏健康茶展示展销中心，喜马拉雅圣茶、藏地茶、墨脱茶……货架上琳琅满目产自西藏的茶叶格外显眼。西藏茶文化协会会长辜甲红说，西藏不出产茶叶的历史已经终结，现在西藏产的高原茶，开始销往内地。

易贡，藏语意为“美丽的地方”。沿着曲折的山路进入易贡茶场，潺潺河水声在耳旁回响，绿色茶田、雪山冰峰不时映入眼帘。

自1963年开辟西藏第一块茶田，经过50多年发展，易贡茶场已是西藏最大的茶场。易贡茶场副场长才程说，刚开始茶场只试种50亩茶树，生产的都是边销茶；20世纪90年代，开始规模化生产边销茶和绿茶；2010年尝试生产红茶；近两年，在全国性电商平台开设网店，网络销售已占销售总额的20%以上。

近年来，易贡茶场迎来发展黄金期。广东援藏工作队专门组建产销一体化团队，援藏技术人员驻点教茶农科学种茶，茶场细茶、边销茶产量分别从2018年5700斤、6万斤提升到2020年的2.1万斤、15万斤。如今茶场的茶叶品种达3大类26个，生产的云雾茶还在全国茶博会上获金奖。

高山云雾出好茶。在西藏墨脱县、察隅县等地，茶田纵横，茶产业作为西藏新兴的绿色产业，受到国内茶界的重视。

2019年，在云南种植茶叶近30年的民营企业家张延礼，把目光投向原始森林深处的西藏波密县。他与中国农科院茶叶研究所等单位合作，筛选培育茶树品种，研发高原古树茶种植加工工艺。这一年，张延礼开始从西双版纳移植15万棵大茶树，种植与西藏本土原生植物共生茶园2600多亩。

“世界屋脊洁净的环境、独特的气候资源非常适合种植茶叶，我们不仅要让西藏人民喝上更高品质的茶叶，而且要让各族人民喝上雪域高原的优质茶叶。”张延礼说。

西藏茶叶的消费结构也在悄然变化。西藏商务厅的数据显示，过去边销茶占西藏茶叶消费的98%以上；2000年以后，红茶、绿茶、花茶等逐渐流行，已占自治区茶叶销售的15%以上。铁观音、大红袍、云南普洱等名茶也不断进入高原市场。

茶，是饮品，又不只是饮品。它见证着千百年来西藏和其他地区的交流交融，也见证着中央对西藏人民的深切关怀和西藏人民生活的巨大变化。

（记者罗布次仁、曹健、张京品、格桑边觉）

新华社拉萨6月8日电

营盘山遗址：一颗牙齿见证文明起源交流

新华社成都6月8日电（记者惠小勇、康锦谦）随着时隔35年的重启发掘，三星堆祭祀遗存再度引起世人关注。围绕着三星堆的许多未解之谜成为人们热议的话题：他们从何而来，是否受到外来文化影响？

对于科学家来说，小小的牙齿或许也能成为解谜关键。

2003年初，考古工作者在四川茂县营盘山遗址发掘出两个人祭坑，其中有两具保存较好的古代人骨标本。经鉴定，均为三四十岁的壮年男子人骨，他们是什么身份，为何要被作为人祭？从躯体陈置来看，两具人骨摆放不规则，呈扭曲挣扎状，体现出当时可能存在的社会等级分化或强烈的原始宗教意味。

更为意外的是，考古工作者对两人的牙齿进行提取后，通过分析竟然还得出其可能体现出黄河上游与长江上游人群交流迁徙的信号：流行于黄河流域的旱作农业代表——粟，在营盘山人群的牙齿中留下了印记。

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员陈剑告诉记者，粟、黍为主要作物的经济模式一般认为属于北方旱作农业形态，“我们不仅在营盘山出土的炭化植物种子中发现了粟和黍，还通过解析牙齿，发现了其人群有食用粟的痕迹。”

“牙齿是人体最为坚硬的组织，一旦矿化生成通常不会被代谢更替，能保留个体幼年时的食谱信息。”四川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副教授原海兵研究体质人类学多年，2013年，他前往茂县，对保存于茂县羌族博物馆的营盘山遗址新石器时代祭祀坑人骨进行了鉴定和提取，并将其运至四川大学考古学实验教学示范中心生物考古实验室，进行了详细的人类学观察与鉴定。

虽然两具人骨大部分已酥脆残损，难以精确测量，但两颗被提取的牙齿仍保留完好的形态，是极为珍贵的分析样本。经过同位素方法科学分析，两颗牙齿的主人幼时食谱结构中可能以鱼类、粟米为主要食物品类。

“营盘山遗址为中国的黄土堆积分布区，土质土壤条件适合北方旱作农业，这可能也是吸引从北方来的先民在营盘山留下的原因之一。”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员陈剑告诉记者。

研究团队经过对颅骨形态特征的研究，发现两人的遗传特征与先秦时期广泛分布于甘青地区的“古西北类型”人群在颅面形态上最为相似。

种种迹象暗示，早在新石器时代中期，与“古西北类型”相似的人群就已经生存在营盘山遗址周边地区，他们很可能与从西北黄河上游向南迁徙于西南山地岷江上游地区的人群存在密切的关系，通过频繁的人群交流互动，对横断山区藏彝走廊的古文化产生重要影响。

专家推测，5000多年前，黄河上游随着气候干冷化趋势的加强，出现了大面积的干旱，粮食歉收，既有农业条件支撑难以为继，已然承担不了不断增加人口的生存繁衍所需，于是，一部分人群开始顺着河谷地带向南迁徙，寻找更加合适的生存地。终于，他们在山林之中，找到了一个理想场所：这面被岷江环绕的台地地势开阔、面水背山、起伏平缓、土地肥沃、气候宜人。

于是，黄河文明与长江文明在此开始交汇融聚，催生出新的古蜀文明果实。

堪以佐证的是，营盘山遗址还出土了大量具备明显仰韶文化晚期和马家窑文化特征的彩陶。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和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联合测试表明，彩陶的化学成分更接近黄土高原仰韶文化及马家窑文化腹地出土的彩陶器物，而素面陶的化学特征显示出与本地黏土更为相似的特征，更大可能表明素面陶为本地自产而彩陶来自外地。

今天，经过大量考古发现，考古学家们已基本构建了上古先民从营盘山、桂圆桥、宝墩等由川西高原到成都平原迁徙的历史，但从黄河上游到长江上游的融合足迹、以及最终如何创造出以三星堆为代表的灿烂古蜀文明，仍留给人们无尽遐想。

但学者普遍认为，就在这片神秘的岷江峡谷里，隐藏着文明交汇的古蜀源流。

百年时光中的澳门“红”

新华社澳门6月8日电（记者李寒芳）百年时光，风雨同心。被称为“莲花宝地”的澳门与祖国同呼吸、共命运，遍布着爱国志士的“红色足迹”。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百年之际，记者踏访革命先烈在澳门的足迹，记录澳门的家国情怀，追忆百年时光中的澳门“红”。

冼星海纪念馆：“黄河大合唱”的莲花摇篮

清晨，位于俾利喇街的一座淡绿色小楼迎着霞光醒来，对面镜平学校的琅琅书声，宛如最动听的乐章。这座两层西式别墅，是由澳门特区政府文化局精心改造成的“冼星海纪念馆”，于2019年11月正式对外开放，作为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和澳门回归祖国20周年的献礼。

1905年，人民音乐家冼星海出生在澳门内港。步入纪念馆，花园内立有冼星海人像雕塑，室内展品包括冼星海的证件、手稿、小提琴、日记、书信和演出服等。置身于馆内，耳畔仿佛回响着黄河的“怒吼”，心头奔涌着黄河的“巨浪”。

澳门特区政府和澳门市民视冼星海为小城的光荣和自豪，澳门还命名了冼星海大马路，发行过纪念冼星海的邮票。2020年，国务院公布第三批国家级抗战纪念设施、遗址名录，全国共80处入选，“冼星海纪念馆”获列名录。

文化局表示，纪念馆有助于让更多人了解冼星海的生平事迹，重温烽火岁月的抗战记忆，特别是增强青少年的国家和民族意识，弘扬和传承澳门人爱国爱澳的精神。

叶挺将军故居：十年旅居不移其志

叶挺将军的澳门故居，位于贾伯乐提督街76号。庭院内一进门就可见到显眼的“叶挺家庭群组雕像”，故居里保存多件原有大型家具及摆设，再现了叶挺一家在澳门共聚天伦的景象。

1927年12月，叶挺参与领导广州起义，成为工农红军总司令。起义失败后，他漂泊海外。1932年，叶挺一家辗转至澳门。

澳门的生活安宁也清苦，叶挺密切关注内地时局发展，随时准备重新投入到中国革命的洪流中去。在日寇入侵、国家存亡之际，叶挺毅然离澳，出任新四军军长，创建抗日根据地。

1941年皖南事变后，叶挺的家人陆续离开澳门。其后，其故居分别作为支援国内革命事业的场所、澳门中华学生联合总会会址及澳门妇联托儿所使用，直至2014年正式对外开放。

南光公司：南国之光永璀璨

1949年8月28日，澳门著名社会活动家、知名人士柯正平借用新马路100号新中行的阁楼，设立了南光贸易公司。这正是如今的南光（集团）有限公司的前身（以下均简称“南光公司”）。

这家当初只有启动资金5万港元、两三套办公桌椅、七八名员工的公司，其后一步步成长壮大为在澳门创办最早、规模最大、实力最强的中资企业。在此过程中，南光公司几易其址，现今位于罗理基博士大马路的南光大厦。

不论是公司创立初期募集物资支援解放区人民、冲破帝国主义封锁，还是新中国成立后办理港澳同胞回乡、推动港澳爱国商人回内地投资，加强澳门与内地的经贸合作与往来，南光公司在许多历史进程中都发挥着特殊重要作用。

2019年10月16日，南光公司举行成立70周年酒会。澳门中联办主任傅自应表示，70年来南光扎根澳门，服务澳门千家万户的衣食住行，生动阐释了驻澳中资企业“根植澳门、服务澳门”的根本宗旨，赢得了澳门居民的充分信赖和澳门社会的广泛赞誉。

镜湖医院：丹心照得杏林春

“一脉分来莲岛秀，万柱移到杏林春。”镜湖医院创办于1871年，从以中医为主的医院发展到今天的现代化综合医院，成为澳门特区医疗服务主要提供者之一。

1892年，中国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先生来到镜湖医院，成为镜湖医院第一位西医，开启了镜湖医院与中国革命的不解之缘。

从上世纪30年代开始，一代名医、中共党员柯麟历任镜湖医院院长及镜湖医院慈善会副主席、名誉主席，镜湖医院也逐渐成为救治革命同志的基地。

“高悬义壶济贫苦，为国为民献终身。”在长期革命斗争中，柯麟一次又一次出色完成党交给的任务，保护了许多干部和革命群众。他以高尚的医德和精湛的医术，广交朋友，团结各界人士，扩大了爱国统一战线，深受港澳同胞的尊重和爱戴。柯麟逝世后，被授予“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共产主义忠诚战士”的称号。

红色印迹遍澳门

澳门议事亭前地的斜对面，是澳门第一座现代电影院——平安戏院的旧址。

1949年11月20日，澳门同胞在此举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大会。在此之前，澳门同胞自发集会捐款，在戏院前搭盖牌楼，这是澳门首座庆祝新中国成立的牌楼。此后至70年代初，搭建牌楼成为澳门同胞庆祝国庆的传统。

距平安戏院不远就是新中行。解放战争期间，这家商业机构在经济上支援了党的工作。如今，平安戏院在改建，新中行旧址和南光公司诞生地经过岁月的洗礼，已演变为商铺，见证着游客如织，繁华兴盛。

澳门的第一面五星红旗，升起在濠江中学。1949年10月1日清晨，一面手工制作的五星红旗在濠江中学升起。尽管澳葡政府施压反对，但时任校长杜岚和学校师生坚定不移、毫不退让，五星红旗飘扬了整整三天。

“中华民族百年奋斗，换来了国家繁荣富强，澳门不曾缺席；顺利回归后，背靠祖国，澳门‘一国两制’实践行稳致远，更拥有了‘映日荷花别样红’。”澳门城市大学协理副校长叶桂平说。